



大湖西

(连载)

杨义堂

张子敬的父亲张学田看着家里人来人往像赶大集一样,不仅不厌烦,还很高兴,他逢人就说:“我张老汉最赞成抗日!现在咱张寨就是抗日英雄大聚会!过去程咬金大会瓦岗寨,宋公明聚义梁山泊,是为了除贪官、铲污吏、杀富济贫。现在张寨英雄大聚会,是为了反对日军侵略,让老百姓过上安生日子,都是一个理儿。日军来侵略我们干什么?!要知道中国人也不是好惹的,一人一口吐沫,就把他们淹死了!”

张子敬找寨主朱德三商量,要在他家的大院里立大伙房,寨主不答应,说万一共产党在这里惹出是非,他担不了责任。张老汉就帮儿子出了一个主意,说寨主有两条“小辫子”,一个是窝藏土匪坐地分赃,一个是吸大烟走私,都是犯法的行当,你别出面,一个村里的,低头不见抬头见,可以让外地来的队员去找他商量,不答应就去县里告他!寨主果然顺顺当当当地答应了。

外地来的干部、学生都分到各家各户住宿吃饭。上千人在张寨活动,吃喝就成了大问题。辛羊乡的著名乡贤朱鸿铎先生闻讯后“雪中送炭”,亲自带人将几千斤高粱、谷子送到张寨。另一位在辛羊庙开酒厂的大富商朱筱舫非常支持张寨抗日自卫团的工作,积极为自卫团筹粮筹款,还为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救亡活动献计献策。张寨村开明士绅张建寅先生,不仅承担了一部分人员的吃饭问题,而且将三个儿子交给了共产党,支持儿子参加革命。

单县中学的学生党员魏钦公等许多青年学生从县城出来,投奔张寨。当初在单县中学读书时,魏钦公和同学们一起办了一个油印的杂志,名字叫《吼声》,魏钦公十分聪明,被同学们称作“机灵鬼”,他很快跟着老师学会了刻钢板,还会刻插图,也被师生们戏称“钢板大王”。为了鼓舞士气,张子敬从小学借来了油印机、钢板、油墨,魏钦公刻印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以及《义勇军进行曲》,发给大家,鼓舞士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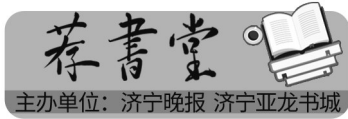
1938年5月上旬,日军逼近徐州,附近中小城市相继沦陷,县委从各大村庄的抗日自卫团中抽调80余人,

在张寨整编为一个脱产的抗日武装联队。

联队组织学唱抗日革命歌曲,除了《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他们还编了一首《千万不能打呼噜》,很接地气,最受联队队员喜爱。不仅队员们爱唱,连村里的孩子们也爱唱,一边学着打呼噜的样子,一边唱:

“日本鬼子打进东三省哟,
我们还在打呼噜(即不觉醒),
日本鬼子打进山海关哟,
人们还在打呼噜,哎哟!
日本鬼子打到卢沟桥哟,
我们才睡醒,
同胞们,醒来吧,
鬼子打进了济南府,
兄弟们,醒来吧,
鬼子打到了家门口。
我们不做亡国奴,
敢与鬼子刀见红,
同胞们,扛起枪,拿起刀,对准鬼子头,
同胞们,千万不能打呼噜……”

这时候,国民党也在单县拉队伍。单县孙溜乡秦庄的刘耀庭最初在西北军跟着韩复榘当兵。1930年韩复榘任山东省政府主席,刘耀庭被任命为特别侦探队长兼湖西局长,1937年“七七事变”后,任第一路军游击司令兼惠民专员。1938年1月,放弃山东逃跑的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被蒋介石枪毙了,刘耀庭则投靠国民党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被委任为第五战区第七游击司令。刘耀庭在单县成立司令部,驻在侯楼乡许河村的蔡家大院里,树起“七路军”的旗号,搜罗武装力量,开始和共产党抢夺地盘。他派外号“刘瞎子”的团长刘则龄几次三番派人来找张子敬,对张子敬封官许愿,要求将张寨的游击队纳入国民党“七路军”。(未完待续)



鲁北散文集 《县,或村》出版

近日,著名诗人、散文家鲁北先生散文集《县,或村》由山东省散文学会融媒体中心策划,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县,或村》是一部充满乡土情怀的散文集,收录了“父母在上”“我是一只1963年的兔子”“后墩的墩”等多篇感人至深的作品。作者用朴实流畅的语言和严谨合理的结构,深情记录了作者对父母的感恩之情,细腻地抒写了自己的人生历程,并热情讴歌了家乡在时代变迁中的巨大变化。作品以真实的情感和深刻的主题,给读者带来了心灵的震撼与共鸣。它不仅仅是一部散文集,更是一幅生动的乡村画卷,一段深情的时代记忆,让人们在阅读中感受到乡土的温度与力量。

(济宁晚报全媒体记者 王艳茹)

在曲阜颜庙中院东碑亭里,一块高4米的巨碑静静矗立。碑首雕刻着腾跃的巨龙,中间篆书“大明敕赐兖国复圣公新庙碑”十二字,碑身下承长2.68米的龟趺座。这便是明英宗正统六年(公元1441年)十一月所立的敕赐复圣公新庙碑,六百余字的碑文不仅记录着颜庙的重修往事,更镌刻着明代皇权与儒家文化交织的深层密码。

全碑通高4米,其中雕龙碑头占0.6米,碑身宽1.26米、厚0.39米,下方龟趺高0.8米、宽1.24米、长2.68米,碑边装饰着古朴的花边。碑文共十八行,每行三十八字,历经近六百年风雨,虽部分字迹因风化略显模糊,但整体仍保持着皇家碑刻特有的威严气象——这样的规制并非偶然,龟趺碑在明代是皇家敕建碑刻的标准形制,龙纹碑首更是等级的象征——只有经皇帝特许,祭祀圣贤的庙宇才能使用此类装饰。

碑刻所处的颜庙,本是祭祀孔子弟子颜回的专祠。颜回作为“孔门十哲”之首,以“安贫乐道”著称,被尊为“复圣”。明代前期,随着朝廷对儒学的推崇,颜庙的地位不断提升。永乐年间,明成祖已重修孔庙,而颜庙的大规模修缮则延至正统年间。碑文明确记载,“朕嗣统之七年,爰新颜庙”,即颜庙在正统七年(公元1442年)完成重修,而此碑作为“文书石”,正是为纪念这一工程而立。

敕赐复圣公新庙碑的六百余字碑文,堪称一篇浓缩的“圣贤论”,开篇即点出核心:“朕惟圣贤之生,皆天以为世道生民计,非偶然也。”此句将圣贤的诞生上升到“天以为世道生民计”的高度,奠定了“天人合一”的基调。

碑文的叙事逻辑层层递进、环环相扣,先立孔



曲阜碑刻(七十一)

明正统六年 敕赐复圣公新庙碑

张铤毅

子之“根”,再显颜回之“脉”,最终完成儒学传承体系的闭环。首先,它确立了孔子的核心地位。“孔子之道,原于天而承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强调孔子虽“不得位”,却通过“推明斯道,立教垂世”维系了世道人心,甚至直言“向微孔子之教,斯世斯人几何其不沦于夷狄禽兽”。这种对孔子的极致推崇,实则是明代“崇儒重道”国策的体现——自洪武年间起,朝廷便将儒学定为官方意识形态,永乐帝更命人编纂《四书大全》《五经大全》,使孔子之道成为治国根本。

在确立孔子地位后,碑文笔锋转向颜回:“三千之徒,孔子独称颜子好学,独告以帝王为治之大法。”这里的“独称”二字,巧妙凸显了颜回在孔门弟子中的特殊地位。碑文进一步将颜回与古代贤臣对比:“使孔子居尧舜之位,则颜子稷、契之伦也。”稷、契是尧舜时期的贤臣,以辅佐帝王成就盛世著

称,这一比喻既肯定了颜回的政治才能,也暗示了他“王佐之材”的属性。

碑文最精妙的内容是对颜回精神的提炼:“圣人之蕴,微颜子殆不可见。发圣人之蕴,教万世无穷者,颜子也。”这里的“发圣人之蕴”,点出了颜回的独特贡献——他不仅传承了孔子之道,更通过自身实践将其具体化、可操作化。碑文以“孔子其太和元气,颜子其四时之春”作比,形象说明孔子之道如天地正气,而颜回如春天般让这份正气得以生长、传播,使“礼乐之授,王佐之期”有了实践路径。

结尾的诗句“作范立教,永淑来世。弼祐皇明,千万亿岁”,则将圣贤祭祀与王朝命运直接关联。在明代皇帝眼中,尊崇颜回不仅是文化传承,更是“长治久安”的政治需求——通过树立颜回这一“道德标杆”,引导臣民修身向善,最终实现“弼祐皇明”的统治目标。

六百年后的今天,当我们再次站在敕赐复圣公新庙碑前,仍能感受到文字背后的温度与力量。它所记录的,不仅是一座庙宇的重修史,更是一个王朝对文化传承的自觉担当。无论时代如何变化,碑刻作为“历史见证者”的角色从未改变。以敕赐复圣公新庙碑为代表的碑林,构成了明清社会的“文字拼图”,让我们得以在官修史书之外,触摸到历史的另一重面相——那里有帝王的治国考量,有士人的精神追求,也有百姓对美好生活的朴素向往。透过碑身上刻写的文字,人们仿佛能听见正统六年那个冬日,立碑工匠敲打鑿子的声响。正是这一锤一凿的坚持,让圣贤的光影得以穿越时空,在当代依然照亮着我们对文化根脉的追寻。而这,或许就是古碑留给我们最珍贵的礼物。